

書的世界

# 佛教聖典

凌遙編著



酒色財氣 · 四大皆空  
參禪悟道 · 化得佛心

書的世界  
16

# 佛教聖典

凌遙編著

國家出版社印行

書的世界 16

# 佛教聖典

70年6月出版

特價：90元

編著者：凌 遙

總策劃：林洋慈

總編輯：王麗芬

出版者：國家出版社

發行所：國家書店有限公司

郵撥帳戶：一〇四八〇一號

公司：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二六之八號三樓

電話：三九一-二四二五·三九一-四二六一  
三九一-七九一八·三五一-〇九一七  
三九二-六七四八·三九二-六七四九

印刷者：三文印書館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六三二號

## 「書的世界」序

詩聖杜甫曾說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是單就他個人的讀書和創作所提出的經驗之談。然而吾人深思，他的哲言實在四海皆準、歷久彌新，尤其在知識爆炸的今日，層出不窮的新理論，源源不絕的新發明，日新月異的新思想，在顯示讀書不僅和從事創作的人有關，每個人的生活起居、應對進退無不和書發生密切關係。有鑑於此，本社乃有一系列「書的世界」的編纂。

古人以「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來形容學者的博覽群籍，然而在當今印刷事業急速起飛，出版書籍汗牛充棟的時刻，要免桂一漏萬之虞，去滄海遺珠之憾，讀書實需有方向有計劃，所謂「偃鼠飲河、滿腹乃止。」吾人以有窮之年壽游無涯之學海，以有限之智悟慧無邊之至理，若乏引渡迷津之指南，茫茫浩瀚，無所駐足，繽紛撩亂，了無歸依。作一個讀書的嚮導，這也即是本社籌編「書的世界」的初衷和用意。

「書的世界」挑選各類精典，內容包羅萬象，舉凡文藝小品、生活拾趣、賢哲傳記、科學理論、文學研究、小如養生靜心之理、大至經世治國之道，皆鉅細靡遺、星棋羅列，概以啓迪心智、發人深省為原則，以增廣見聞、厚積學力為目的。前人曾云：「一日不讀書，則覺言語乏味、面目可憎。」希望「書的世界」能為各位讀者帶來更充實的人生。持著這樣的理想，本社雖力求臻善，然自不免有缺漏不足之處，尚祈讀者各界，不吝針砭，以匡不逮。

國家出版社 謹識

# 佛教簡史

## 一、印度

佛教的創造與發展在人類的文化史上占有輝煌燦爛的一頁。那個時代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之一，因為「亞洲的炬光」就是於此時期，在印度中部轟轟烈烈的被點燃了。佛教中所蘊含的智慧與慈悲，如同不斷湧出的泉水一般，在後來的數百年間，普遍滋潤了我們亞洲民族的心靈。直到今天，佛教依然是亞洲大多數人民精神上的支柱與信仰。

佛陀瞿曇(Buddha-Gautama)——也就是後世佛教徒所崇拜頤仰的「釋迦牟尼」，亦即「出自釋迦族的聖者」，在出家之後便離開了故鄉，輾轉來到了印度半島南部的摩伽陀(magadha)國，在一棵菩提樹下悟得了實智真理，而成就了正覺(成佛)。根據推測，這大約發生在西曆紀元前五世紀中葉。從此之後一直到其「偉大的死亡」(大般涅槃)為止，約有四十五年之久，釋迦不畏艱難阻撓的四處傳播其智慧、慈悲之教，化開緣說法，普渡衆生。到了同一世紀末葉，中印度諸國及各部族之間已然構築了許多足以防範罪惡的法城，壯碩而屹立不搖。

阿育王 (A'soka) 是孔雀 (maurya) 王朝的第三世居王。在他位的時期 (西曆紀元前二六八—二三二年)，佛陀瞿曇的教義已經遍佈了印度的每個角落，後來甚至越過了本國的領域，遠播到其他各國。

孔雀王朝是印度第一個統一王朝，其第一代國王察德拉古普達 (Candra-gupta) 在位的時代 (西曆紀元前三一六—二九三)，其版圖已經北至喜馬拉雅山，東抵孟加拉灣，西達奧都庫什山脈，南到維因地雅山脈 (Vindhya Range) 之南。到了阿育王繼位，續又征討了其南方的羯陵迦 (Kalinga) 等地，將版圖擴展至德干高原。

阿育王原是個性格粗暴之人，據說人們皆稱呼他為「可怕的阿育」。但是當他征討羯陵迦時，目覩展現在眼前的慘狀，血流成河，屍陳遍野，因而慈悲心大起，性情丕變，最後成為智慧及慈悲之教的虔誠信徒。從此之後，阿育王便以佛教的身份樹立了許多善行功德，其中最值得後人矚目稱頌的是下面兩件事情。

第一項偉大事蹟是在版圖所及的各地，留下了所謂的「阿育王的刻文」，也就是將以佛教為依據的施政方針在石柱上，或刻在斷崖上面。第二項功蹟是一方面在印度國境弘布佛陀之教法，一方面派遣使節翻山越嶺，遠渡重洋，到西方各國去傳播佛教智慧、慈悲之教旨。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的使節被派遣到遙遠的敍利亞、埃及、希臘、馬其頓、艾非勒斯等地，佛教從

此就被廣泛的傳到西方世界。當時被派遣至達姆拉巴爾度（即今日的斯里蘭卡）的使節摩亨德拉，成功的「在美麗的楞伽島樹立了美麗的宗教」，使斯里蘭卡成為所謂「南傳佛教」的發祥地。

## 二、大乘佛教的興起

後代的佛教徒經常使用「佛教東漸」這句話，似乎佛教是西方精神思想的產物。事實上，在西元前數世紀裏，佛教傳佈的方向一直是朝向西方，直至約西元元年前後的時期，才又轉回東方。而在談到佛教東漸這件事之前，我們必須先提一提佛教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就是「大乘」的勢力逐漸抬頭，終至在佛教中佔據了顯著的地位，成為佛教中的主流，影響深遠。

這一新的潮流究竟是在何時由何人所創，其產生的過程又是如何？時至今日我們仍無法確切的得知。我們對於大乘佛教的認識僅止於以下兩項：第一 這必定是由富於創造、革新，以及進取精神的比丘們所倡，而源於「大衆部」的思想體系。第二 在西元前一、二世紀起至西元後第一世紀為止的時期，大乘佛教中的幾部重要經典已經問世。之後「龍樹」以這些大乘經典為基礎，融合了自己的智慧與見識，締造出更為周密完滿的思想，大乘佛教的面貌也就更為鮮明的呈現在佛教史的舞臺上，而且佔據了重要地位，散發出燦爛的光輝。

在悠久的佛教史上，大乘佛教所以能擔任重要的角色並非偶然，也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即將說明的中國佛教以及日本佛教，自始至終一直深受大乘佛教的影響，可見大乘佛教必有其獨特優越之處。

在大乘佛教之中已經揭舉普渡衆生的新理想，並且塑造出一種新的形像——菩薩，作為人們實踐此一偉大理想的終極目標。同時大乘思想家們在形而上學，以及心理學領域所締造的偉大成果，也是使大乘佛教興盛不衰的強有力支柱。從此以後大乘佛教雖然是延續了佛陀瞿曇的教法系統，但是另一方面也添加了許多新的思想，匯聚成一股洪流，使此智慧、慈悲之教更富熱忱，更有活力，滔滔的流經東方各國，滋潤了人們的心靈。

### 三、西域

中國人經由西域才認識了佛教，因此若欲談論印度佛教是如何傳入中國，則必須先從西域的孔道——絲路談起。

在西元前二世紀末葉，中國漢武帝時代（西元前一四〇—一八七），開闢了一條溝通東西兩個世界的貿易路線，也就是經由亞洲中部荒涼地帶的絲路。當時的漢朝版圖已經擴展至遙遠的西邊，與漢土毗鄰的西方諸國如大宛（Ferghana）、康居（Sagdiana）、大月氏（Tukhara）、安息

(Parthia) 等國，其自亞歷山大大帝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商業精神，依然十分興盛，所以經由絲路來往的貿易也十分繁榮。而在當時的東西貿易中，中國的絲綢扮演了一個最為重要的角色，這也是這條道路被稱為「絲路」的原因。東西兩個世界的文化也經由絲路而互相接觸，彼此交流。在西曆紀元前後，發祥於印度之佛教便是經由絲路而傳入中國，爾後蓬勃發展，因此絲路也可稱為佛教之路。

## 四、中國

欲探究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情形，必須先從中國人對佛教經典的求取與翻譯談起。自古以來大家都認為最早到達中國的佛經是後漢明帝永平年間（A·D五八一七六），由迦葉摩騰等人所攜帶而至，並且加以翻譯的『四十二章經』，但是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這是一種非常可疑的傳說。證之史料，中國的譯經事業約始自在洛陽從事譯經的安世高。他在西元一四八年左右至一七一年左右這段時間裏，翻譯了許多佛經，對譯經事業的發展頗有貢獻。從此時起一直到北宋年間（九六〇——一二九）約千餘年的時間裏，中國的佛教經典翻譯事業就不會停止，一直在蓬勃的發展。

在佛教傳到中國的初期，西域各國的和尚紛紛携帶着佛教經典來到中國，並且擔任譯經的重要工作。譬如我們剛才提到的安世高，就是來自安息國的僧侶。在第三世紀左右抵達洛陽，翻譯

『無量壽』經的康僧鎧是康居地方的人。以『正法華經』之譯者而聞名的竺法護來自月氏，他從第三世紀後半葉到第四世紀的初葉為止，一直在洛陽、長安從事佛經的翻譯。到了第五世紀初葉，鳩摩羅什由龜茲來到中國，這時中國的譯經事業達到了顛峯。

大約也是從這時候起，中國的僧侶開始到印度去學習梵語和求法取經。此一活動的先驅者是法顯（三一九—四〇？），他在東晉安帝隆安三年（三九九）從長安出發，經過十五年的歲月才返回中國。史上最著名的人竺求法僧當推玄奘（六〇〇—六六四），他於唐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出發往西而行，直到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方歸，期間長達十九年之久。義淨法師（六三五—七一三）則在唐高宗咸亨二年（六七一）經海路到達印度，經過二十五年之後仍由海路返回中國。他們到印度去學習梵語，並且選擇經典携回中國。他們回國後大多成為譯經的主要人物，尤其是玄奘，由於他深厚的學識與優異的語文能力，使他在當代的譯經者中出類拔萃。經過他大量的翻譯，使得中國的譯經事業達到了另一高峯，因此學者們稱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前期翻譯家所譯的經文為「舊譯」，而以玄奘以後翻譯的經文為「新譯」。

中國人透過大量翻譯的佛教經典而更深刻的瞭解了佛教的涵意，佛教的思想和宗教的活動也因而更為盛行。但是中國人漸漸的在其中揉和了許多民族色彩，使之順應我中華民族的特質與需求，使佛教在中國呈現出一種嶄新的、富於民族精神的風貌。

在佛教初傳至中國時，中國人對於般若部所言的「空」特別傾心，這正表現了中國人喜談形而上學的特質。不久之後，中國人捨「小乘」之教而就「大乘」，此亦表露了中國人的精神傾向。這種傾向到了天台宗成立之後更為顯著，待禪宗出現後，更可謂到了極至。

第六世紀後半，天台大師，亦即智顥（五三八—五九七）匯集佛家各派思想而自成一派，天台宗的思想體系在其手中遂告完成。天台大師的智慧代表了中國的佛教思想，他所樹立的「五時八教」的教判，對於中國及日本的佛教皆產生了無遠弗屆的歷史性影響。

根據推測，佛教經典之傳入中國，並無依照經典成立的先後次序，而譯經者也是見著一本佛經就翻譯一本，並沒有加以整理，所以形成非常零散混亂的局面。當時的佛教界人士面對着如此龐雜浩繁的經典，實有必要對其成立的先後，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價值加以討論，因而產生了許多紛糾的見解。由於對佛教的研究方法不同，以及所依存的經典互異，而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教判」——或稱為「教相判釋的課題」。教判是中國人以其固有的民族思想而背景而對佛教所作的探討，已經不是單純的佛教思想，而呈現出濃厚的中國色彩。其中尤以智顥的教判最為完整有條理，所以也最受推崇與信服。但是近代新的佛教研究方法出現後，天台宗的統轄性影響亦隨之告終。

在中國佛教史上，禪宗的境界在各宗各派中是最深的。為大家所敬仰的禪宗始祖是來自外

國的沙門·菩提達摩（？—五二八），傳到六祖慧能（六三八—七一三）之後，禪宗的思想已然成為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其所播撒的種子皆成為佛教界的燦爛奇葩。第八世紀以後，人才鑾起，使禪宗在中國佛教史上延續了長達數百年的隆盛。

如問禪者心中所懷抱、信仰的是什麼，他們一定會回答「佛祖正傳」或「教外別傳」。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認為欲求「教」必從「經」入手，所謂「教不外經」，所以中國人耗費了數百年的時光，致力於佛教經典的尋求和翻譯。但是到了禪學成立流布之後，却將前人在這方面的功勞全部推翻殆盡。他們宣稱除了釋迦牟尼的言語之外，還有「別傳」的存在。他們潛心於對坐、參禪，認為這才是佛祖的正傳。

當我們對於這種深奧難明、令人感覺無法思議的禪宗思想詳加探索時，將可發現乃根源於中國人的天資秉賦，而又合乎我國的民族思想體系，所形成的一種新的佛教觀念，與外來的佛教截然不同，這正是禪宗之所以盛行不衰的原因。但是佛陀瞿曇之教也包容了這一新支流，匯成更寬廣的巨河，繼續流向其他東方各國，直到今天仍然滋潤着人們的心靈。

## 五、日 本

日本佛教的歷史始自第六世紀。紀元五三八年，百濟王派遣使臣至日本，向欽明天王之朝進

獻佛像和經卷。從此佛教可算是正式傳入日本，迄今已逾一千四百年之久。

在這悠長的佛教史中，我們可以把焦點集中在三個時期來觀察。

第一個值得我們注目的時期是西元第七、八世紀。若以具體有形之物來劃分，則是從法隆寺的興建（六〇七）至東大寺的竣工（七五二）之間的時代。回顧這一個時代，有一件事情是我們絕不可忘懷的，那就是在這個時期，亞洲各地區都掀起了異常高昇的文化潮流。在西方文明仍然閉鎖在黑暗之中時，東方文明却以令人驚訝的活潑氣象展開了繁榮、壯闊的活動。

在中國、西域、印度，乃至南海諸國，無論是學術、宗教，或藝術等等，都呈現了亘古未有的蓬勃朝氣，佛教乃結合了這一切的精神文明，形成一股波濤洶湧的人文主義浪潮，淹沒了整個東方世界。同屬東方國家的日本，自然免不了此文化浪潮的影響，而在其原本荒蕪的土地上，開展了種種新氣象。輝煌奪目的法隆寺，和巍峨壯麗的大東寺之興建，以及以其為軸心所展開的各項多采多姿的宗教、藝術活動，都是此一浪潮所激起的浪花。

日本自古原是一直處於未開發的狀態，經過了此偉大的文化浪潮的洗禮之後，頓時躍入了文化之國的行列。這正是第七、八世紀的日本人民所遭受的重大轉變。此一國際性文化浪潮的主流當推佛教，因此在那個時期，佛寺成為國際性的文化中心，僧侶躍為新學識的倡導者，佛教經典則被人們奉為圭臬。佛教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宗教而已，它實成了一種廣泛而偉大的文化。以上

所述便是西元第七、八世紀佛教初傳至日本時的經過情形。

進入第九世紀以後，出現了最澄（七六七—八二二）和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兩位偉大的佛教思想家，創設了通稱「平安佛教」——亦可謂爲「日本佛教」的宗派。在此以前，佛教在日本流爲貴族們的休閒專利之一，此後才恢復了佛教本來面目，而致力於修行。並且把佛教從都市裏帶入了深山之中，在山裏建築修行的根本道場。三百餘年之後，源流自此二人的天台、真言二宗分以朝廷和貴族爲中心而繁榮，流傳下去。

第二個值得我們注目的時期是西元第十二、三世紀。在這個階段裏曾經出現了許多卓越的佛教家，諸如法然（一一三三—一二二二）、親鸞（一一七三—一二六二）、道元（一二〇〇—一二五三）、日蓮（一二二二—一二八二）。這些偉大的佛教家對日本的佛教發展有巨大的貢獻與影響，時至今日，凡談及日本的佛教必定要提到這些人物，否則就無可談論。我們可以說，由於這些偉大佛教思想家的出現才使日本的佛教具有充實的生命與意義。

至於爲什麼僅僅在這段時期，日本的佛教會如此的絢爛發展呢？其中實隱含了其時代背景與共同意識的因素。佛教發展到了這個時期，已達必須與自身文化相融合的階段，所以日本人亟需以日本的方式去重新認識佛教、接受佛教。在此時代的共同課題之下，遂產生了許多思想見解俱優的佛教家，締造了日本佛教史上的第二個爲萬世矚目的興盛時期。

如此說來，或許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佛教不是早在西元第六世紀即已傳入日本了嗎？為什麼遲至現在日本人才面臨接受佛教的問題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歷史上雖然記載佛教早於西元第六世紀即已傳入日本，但是任何一項新文化在初傳入時，人們只能毫無選擇的全盤接受，他們無暇亦無法對此新文化加以深入的探討，必須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消化，才能使之融合成爲本身文化的一部分。總而言之，接受一種新文化的工作不是一蹴可幾的。日本這個國家在西元第七、八世紀開始努力的接受佛教，從此以後歷經數百年的歲月，以及許許多多佛教思想家們的心血灌漑，才使得佛教在第十二、三世紀裏綻放出繽紛燦爛的花朵。而第十二、三世紀的一羣佛教思想家，正是促使百花怒放的偉大功臣，其在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自是不容後人等閒視之。

從此之後，日本的佛教便在前人所遺留下的穩固基磐上順利的發展，保其餘榮直到今天。自從十二、三世紀產生了一批傑出的佛教思想家之後，在日本的佛教史上就不會再度出現更輝煌的智慧之星。換句話說，日本的佛教自從十二、三世紀鼎盛繁榮之後，一直沒有再造另一個高峯，充其量只是保持其不墜罷了。不過，綜觀其後的日本佛教發展史，似乎有一點仍然值得我們加以關注的，那就是近代的日本佛教學家對於原始佛教的研究成果。

從佛教初傳至日本迄今，日本的佛教一直受着中國佛教的影響，也就是以大乘佛教爲主流。尤其是第十二、三世紀時期，那些傑出的佛教思想家輩出，就是以禪宗的宗祖爲宗，而對大乘佛

教的思想加以探討研究。一直到明治年代中期，日本的佛學家開始轉向對原始佛教的研究。從此以後，人們除了知道佛教宗祖之外，也逐漸的憶起了曾經被人忘懷的佛教之祖——佛陀瞿曇。致力於研究原始佛教的學者，將完整的佛教法開展在那些只知有大乘佛教之人的面前，使人們得窺佛教之原始風貌與意義，而不再侷限於大乘佛教的境界裏。

這項研究的新趨向雖然仍停留在學術的領域裏，尚未喚起普遍大眾的宗教熱忱，但是至少使沉寂已久的日本佛教界對於佛學的追求有了新的轉變，而可能再造佛教學術史上光輝燦爛的另一頁。

## 六、佛教聖典流傳史

佛教是以釋尊在其一生四十五年之間所說的教法為根據的宗教，所以釋尊的話語在佛教裏面具有絕對的權威性。雖然佛教有八萬四千法門，各有不同的宗旨，形成不同的流派，但是始終不違釋尊的說法。而且各門各派的佛教人士同時都將釋尊的言語教誨記載下來，遂成了所謂的「一切經」或「大藏經」等珍貴的經典。

釋尊極力主張人類的平等，同時他又以淺近的日常用語來說教，以便使男女老少、鴻儒白丁都能徹底的瞭解。一直到釋尊八十歲謝世的那一天為止，他都不會有片刻的休息，總是為着世人